

《南京城市规划探索与实践》丛书 ①

南京市规划局 编



NANJING HISTORY
南京城市史

薛冰 著

南京出版社

《南京城市规划探索与实践》丛书 ①

南京市规划局 编

NANJING HISTORY

南京城市史

薛冰 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城市史 / 薛冰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8.6

(《南京城市规划探索与实践》丛书①)

ISBN 978-7-80718-394-5

I.南... II.薛... III.城市史—南京市 IV.K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4878号

责任编辑 卢海鸣

装帧设计 周涌

南京城市史

薛冰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43号 邮编: 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新中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2 印张 14.5 字数 300 千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80718-394-5

定价: 200.00 元

引言

1988年，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江宁湖熟镇的梁台上，可以捡到石斧和青铜箭头，我当即决定与他一起远征。我们前后去过三次，最后一次是1991年的秋天，在那场号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之后，梁台的文化土层已经被抗洪大军挖掉了一多半，筑到了不远处的大坝上。无论是作为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还是作为传说中的梁代昭明太子读书台的遗址，这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已不复存在。

在梁台上下，我们捡到过鬲足、纺轮、网坠，鹿角和兽牙化石，石刀的残片和青铜箭头。近十米高的梁台土层中，夹有大量蚌壳、螺壳等水生动物化石，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曾沿着田间的小路，走到离梁台不远的小河边，伸手掬起清澈的碧水，想象如流水一样逝去的时光。三四千年前，为南京的先民提供生存基础的，就是这条看不出一点沧桑痕迹的河流吗？从水边到台地，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吗？他们会怎样对待闯进这世界的同类与异类？他们又是怎样度过那漫无边际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呢？

单凭我在梁台捡拾的历史碎片，要想重现先民生活的完整图景，是太困难了。

18年后，当我试图勾勒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长与变迁历程时，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的梁台之下。应该说，这次所面对的题目难度更大。因为，城市文明兴起的进程，同样是一种不稳定的、极易变化的展现形式，只有沉淀下来的，才能为后世所知。2500年来，这座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经历了太多曲折和风波。就像长江大河，谁能分辨得清它的每一滴水是来自哪一条溪流？就像一幅画，

不断地被人修饰、增补、改作甚至抹去重绘，现在还有可能恢复它最初的面貌并再现这变化的过程吗？

仅凭我所亲历的50年南京生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即使再加上南京现存的全部历史文化遗迹，也还不足以复原它悠久的成长经历。

幸运的是，自六朝建都，就有人开始为这座城市立传。历代累积起大量的文献资料，时代越晚就越丰富。近百年来，更有不少前辈学人和师长朋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贡献出丰硕的成果。这就为我提供了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

不过，前人对于南京城市成长历程的观察和探索，至今仍不无令人遗憾之处。

首先，在古代史范畴中，对于不足500年的建都史，研究较多，而对于长达两千年的非建都史，关注不够；在历代建都时期，对于封建都城相关设施的研究较多，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环境的探索不够；对于城市发展形态的描述较多，对于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形态的思考不够；对于城市与居民的关系，对于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阐述得也不算充分。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历代官私记述中严重的重官轻民倾向，重政治轻经济倾向，使得今人很难获取对南京城市成长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所需要的相应资料。其次，对于现当代南京的发展成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十几年发生的巨变，虽然原始资料保存较为完整，也不乏局部评述，但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探索，似乎还没有见到。尤其是当前，在走向“和谐南京”的进程中，

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更需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这就使本书的写作,具有了现实意义。

辨疑解难,总结近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历史从来就是叙述者的历史。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也就都可以贡献自己的记录,表达个人的评判。

与历史是对已逝时间的记忆一样,城市实际上是对已逝空间的记忆。从表面上看,面对既有空间,城市选择“记住”什么和“忘却”什么,往往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城市的外在形态,屡屡因重要政治元素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但是,城市决不仅止于政治的范畴,它的发展,还有其内在规律可寻。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尤其是城市的基本居民,是城市得以保持其延续性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历史的长链上,探寻那些失落的环节,拼合那些碎裂的画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就像我们翻阅一个人的旧相册,不但可以准确地了解照片记录下的瞬间,也大致能够推测出未被拍摄的时光了。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回溯古代南京城市成长、变迁历程,对已有定论的内容,叙述从简;提出不同材料或不同看法之处则力求严谨。对于某些时段、某些方面相关记录的短缺,我将尝试进行填补,即依据南京城市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参考时代相近的私家笔记以及文学作品,进行适度的猜想和推测,提出一些假说。下编关注的是现代规划出现之后的一百年中,人们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简言之,可以说是疏理旧识,补充记忆,阐明新见。我希望它能为读者提供一轴较为完整、清晰的南京城市成长史图卷,并藉此理出南京城市发展的脉络,以便于总结既往的经验教训,为促进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尤其是最近这个城市急剧发展的时期,也需要及时予以整理与总结。

错过时机,后人将更加难以措手。

我本是做文字工作的,来写这样一本关于南京城市演变发展的书,似乎完全背离了本行,也有些不自量力。但我仍然决定要把这件事做好。这是因为近十年来,我对城市文化的迷恋日盛一日。城市像语言文字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二者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我在这二者之间发生转换,也就不算太离谱。不过本书20万字的篇幅,除了长时期的相关积累以外,断断续续地写了整整一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大约是写得最苦的一本书了。

近年以来,国内地域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也已形成社会共识。在当前国际、国内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作为软实力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加强文化建设、维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研究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内容,更是城市文化不断升华的根基和培育新的城市精神的源泉。不同的地域文化以自身的特殊内容,也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21世纪,江苏省正在建设文化大省,南京市也在倡导“文化强市”。完成这样一本书,也就算我对生活于其间半个世纪的城市,对她的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不过,我毕竟不是城市建设与历史考古的专家,所以这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只是文字意义上的城市研究,是对前人的相关记录与求索,重新进行整合和解读。当然,我也有一点小小的野心,就是希望本书中的评判与解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希望本书中的某些假说或预见,能够被将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或城市发展的现实所证明。

目 录

引 言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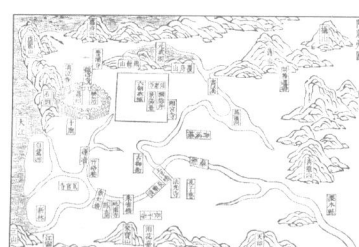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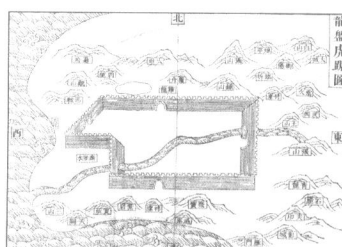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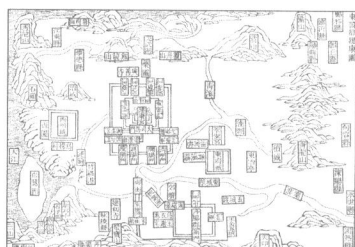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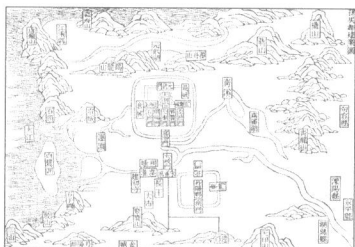
上 编

未有城市之先	2
从边缘走向中心	6
从石头城到太初宫	12
东晋建康城的规划与发展	21
南朝建康城的建设	28
隋唐时期的商业都市	37
南唐的整合与宋元的延续	45
明都南京	57
清代南京——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前奏	72

下 编

民国建都与《首都计划》	88
新中国最初 30 年	103
改革开放与城市控制	114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	120
进入 21 世纪	130
走向“和谐南京”	156
后 记	163

上 编



未有城市之先

我们的考察，将从远古开始。

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通过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探索城市最初形成的原因，了解它的原始结构和功能，并追随它所经历的全部曲折风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清这座城市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发展成现在的形态，才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一座城市，

在沿着文字的时光隧道返回远古之前，我们需要做一回思维的体操。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对现实南京的全部印象，所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当时还都没有出现，真正是一片“白茫茫大地”。那时能够作为地标的，大约只有自然的山陵江河，钟山、覆舟山、鸡笼山、幕府山、石头山，长江、秦淮河、金川河；甚至连它们的命名，也是后来的事情。同时还要注意，山的位置，是不容易改变的，而江河的水道，则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水岸线。书中借助今天的地标和地名以说明大致的方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容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

其次，我们关注的范畴，是当代的南京，但南京这座城市也是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块土地曾隶属于不同的建置，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建业、建康、金陵、江宁以至明代的南京，都不能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南京。在每一个建置时期的开始，笔者将对其实际内涵做出说明。同时，为了照顾今人对南京城约定俗成的观念，在叙述古代城市发展史时，本书也将范畴界定为主要是明城墙以内的区域，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南京老城区。事实上，直到21

世纪初，明城墙这个主城边界才真正被打破。

打一个比方，我们仿佛在做着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搭积木游戏，而且哪一块积木该在什么时候放到什么位置上，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已经搭成的部分，还会改变形状；已经放下的积木块，还会被移到别的位置上去。最困难的是，这片宏伟的建筑群其实已经搭成，我们实际在做的，是按照建设顺序将它们逐次剥离，退回到自然的原初状态。就像摁下CD播放机上的后退键，能将碟片从结束返回开始。

然而，在历史的大屏幕上，没有这种后退键。

所有的工作，都得由我们的大脑来完成。

人类对于南京这片土地的认识，很可能开始于35万年之前。

1993年3月，在南京江宁区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中，出土了两件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件属于成年男性，一件属于成年女性。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这一发现将南京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前了30几万年。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溧水县回峰山北麓神仙洞中，有距今11 000年左右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尽管两者之间隔着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南京人老祖宗的居住环境却说不上有什么进步，都是住在自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里。

人类在南京地区的早期建设行为，出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人类的居住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原始聚居地，分布在秦淮河流域、金川河（包含玄武湖）流域、长江两岸直到六合的滁河流域等地区。

发展到距今3 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可考的原始村落就有200多处，而以秦淮河中游今湖熟镇一带最为集中，所以考古学界以“湖熟文化”命名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秦淮河流域的点将台、船墩、磨盘山、神墩、朝墩、梁台、老鼠墩、前岗、橙子墩、神山头，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处于较高的地势之上。所以考古学上又将其称为“台型遗址”。

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位于今鼓楼岗西侧、金川河东岸的北阴阳营古文化遗址，在大约10 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厚约四米的文化层堆积，证明在大约3 000年的岁月里，几度有人类在此生活。在第一层表土层之下，分为三个文化层，第二层属于湖熟文化，相当于中原西周初期；第三层距今约3 800年到3 500年，相当于商代早期；遗址的主要部分是第四层，属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是南京主城区内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因此也可以算是这一地区最早的文化形态。

新石器时代，从鼓楼岗到鸡笼山、覆舟山，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林间生活着鹿、豪猪等多种野兽。山岗的周围，则是大片的湖泊和沼泽，水中生活着鱼、蚌、龟、鳖。当时南京地区水域的面积远远大于现代。长江的位置要更为偏东，大致在今天的外秦淮河一线。秦淮河宽达数百米，由东南而来，浩浩荡荡穿过南京地区，在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钻出，折向西北，主流在今金川河一带进入长江，所以玄武湖（古名桑泊）只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从今玄武湖往西，直到金川河流域，都是一片汪洋，其南岸直抵鼓楼岗下。先民们就选择了这山水密林之间的一个椭圆形台地，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遗址长约150米，宽约100米，在发掘时还高出平地约七米。

通过文字了解这种台型遗址，总不如亲眼看到实物来得真切。所以我对湖熟梁台的被毁，十分痛心。直到被毁之前，那一带的地形地貌，还能大致看出远古时期的痕迹。梁台独立在小路旁，与河流之间是比水面高出一米左右的成片田地，周边也没有复杂的建筑。可以说，很容易就能复原出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一种真实场景，不但可以作为科普教育的基地，也

完全可以和相距不远的杨柳村古民居一样，成为江宁地区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

南京的先民们选择这种水边台地定居，是因为那几千年中，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还很弱，只能顺应自然，趋利避害。近水而居，一是生活用水和鱼蚌等食物容易取得，二是在附近较低一级的台地上种植农作物，排水浇灌都方便，三是水上交通便利；而高居台地之上，又可以避免水淹之灾，满足安全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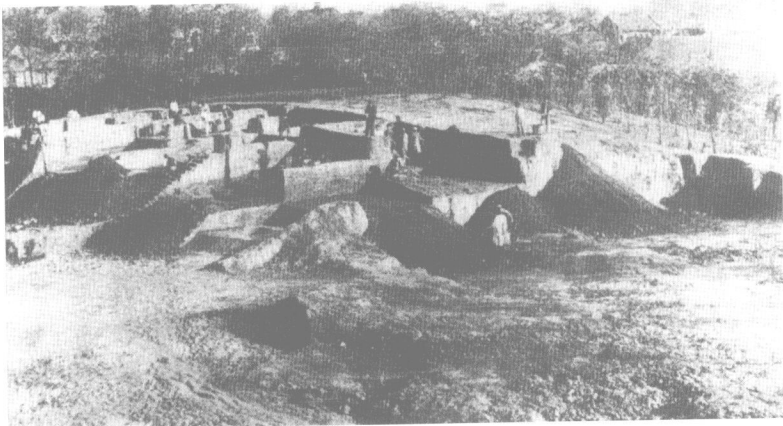
尽管这一时期完全没有留下文献记载，但今人对于这些原始居民村落的了解，甚至可说比对六朝都城的了解更明确，因为有科学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当然也因为这些原始村落的结构相对简单，解剖若干就可以推断其余，根据其规律，大致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

北阴阳营遗址是迄今所知南京城内最早居民区。在这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中，已经出现了不同功能的分区结构，大体是东部为居住区，西部为墓葬区。

居住区有一块供公共聚会活动的中心场地，居民的住所环绕在中心场地周围，这可以算是南京最早的建筑秩序。这一秩序体现出原始人类对于交流的重视。城市学家则将这种礼仪性汇聚场所，视为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种会所处于原始村落的中心位置上，不但具有优良的自然条件，而且还会具有一种精神的、超自然的威力，吸引或召唤着家族和氏族的成员。家族成员的住房处于地面之上，底部呈长方形，最大的住房面积达35平方米；墙壁的建造，是以植物茎干编为支柱，再抹上草泥，并加以烘烤使其坚固；房顶可能用茅草或树皮覆盖，以遮避风雨。类似的简易窝棚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到当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原始居室内地面，不但用掺沙拌草



北阴阳营遗址外貌



北阴阳营遗址发掘现场

的白泥抹平拍实，而且经过火焙，变得极其干燥而坚硬，能有效地防潮。这大约可以算南京先民最早的住宅装修工作了。可能因为江南气候温暖，灶室另建在住房之外，或圆形，或方形，也是南京先民居住区域的一大特色。在室外还有用于储藏的窖穴。按照西方人类学家的理论，贮藏和定居，可能是原始人类的特性。

村落西部是氏族的墓葬区。当时的墓葬形式十分简单，不见墓坑，也没有棺槨，尸体直接置于地面上略加掩埋，头向一律朝东北，身边有简单的随葬品，多为石器和陶制用具，偶有玉质饰品。这可以看作南京人最早的礼俗。墓葬成群密集，而且上下叠压多达四层。居住区在东而墓葬区在西，是有道理的，因为南京地区夏季多东南风，而冬季才有西北风。墓葬区在夏季难免有不洁的气味，所以必须处于下风。事实上，死人是先于活人实现永久定居的。很可能正是由于祖先埋葬于此，才吸引了先民们长期生活于此，或不断返回此地。

在村落南边稍低一级的台地上，有种植稻谷等作物的农业用地，有畜牧场地，还有磨制石器和制陶的场所。

综上所述，在城市远未形成之前，类似于后世城市的功能分区就已经出现了。按西方城市理论家的说法，村庄的秩序、稳定性、保护作用、安全感与自然力的统一，也都由城市继承了；而人类对故园、旧居的依恋，其深刻的心理渊源就在于此。

先民在北阴阳营的生活，持续了大约几百年，后来不知道是由于洪水还是其他原因，居民们分别向秦淮河南岸和长江北岸迁移。到了距今三四千年间的商代早期，才又有居民从秦

淮河南岸迁来，在北阴阳营兴起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考古发掘显示，北阴阳营第三层文化遗存，受到了河南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受到太湖流域马桥文化和山东岳石文化的一定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风格。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而言，这种影响不可能是直接施予的，应该是通过一连串的短途贸易交换而完成的。南京文化的多元性，在这时就已经有所体现。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中时代最晚的第二文化层，属于湖熟文化。湖熟文化被认为是江南荆蛮族的土著文化，属于从新石器文化晚期向青铜文化、铁器文化发展的过渡时代。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南京先民的聚居方式，逐渐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演变为地域性的部落联盟，生产规模有所扩大，社会分工逐渐明确，居住区域也有相应集中的趋向。从现已发现的200多处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看，集中在秦淮河流域特别是中游湖熟镇一带的，多达百余处，长江北岸今浦口区境内也有68处，六合区境内还有七处，恰恰是现代的南京城市中心区，至今仅发现北阴阳营一处。这有可能是考古发掘的缺失，某些遗址在未被认识其价值的时代，已经被后人的建设所毁灭，尤其是在开发较早的老城南地区。但直到20世纪才真正得到开发的城北地带，迄今也只在珠江路西口北门桥附近，发现过小范围的商周居民生活痕迹。此外再没有新的发现，所以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生活环境不及其他地区。如果确实如此，北阴阳营的居民，如果想去探望他们的邻居，就得跋山涉水，跑到四五公里以外。这对先民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种交往即使存在，也不会多。或许正是交流融合机会的缺少，以至过少人群之间的近亲繁殖，使得北阴阳营的原始村落难以延续发展，最终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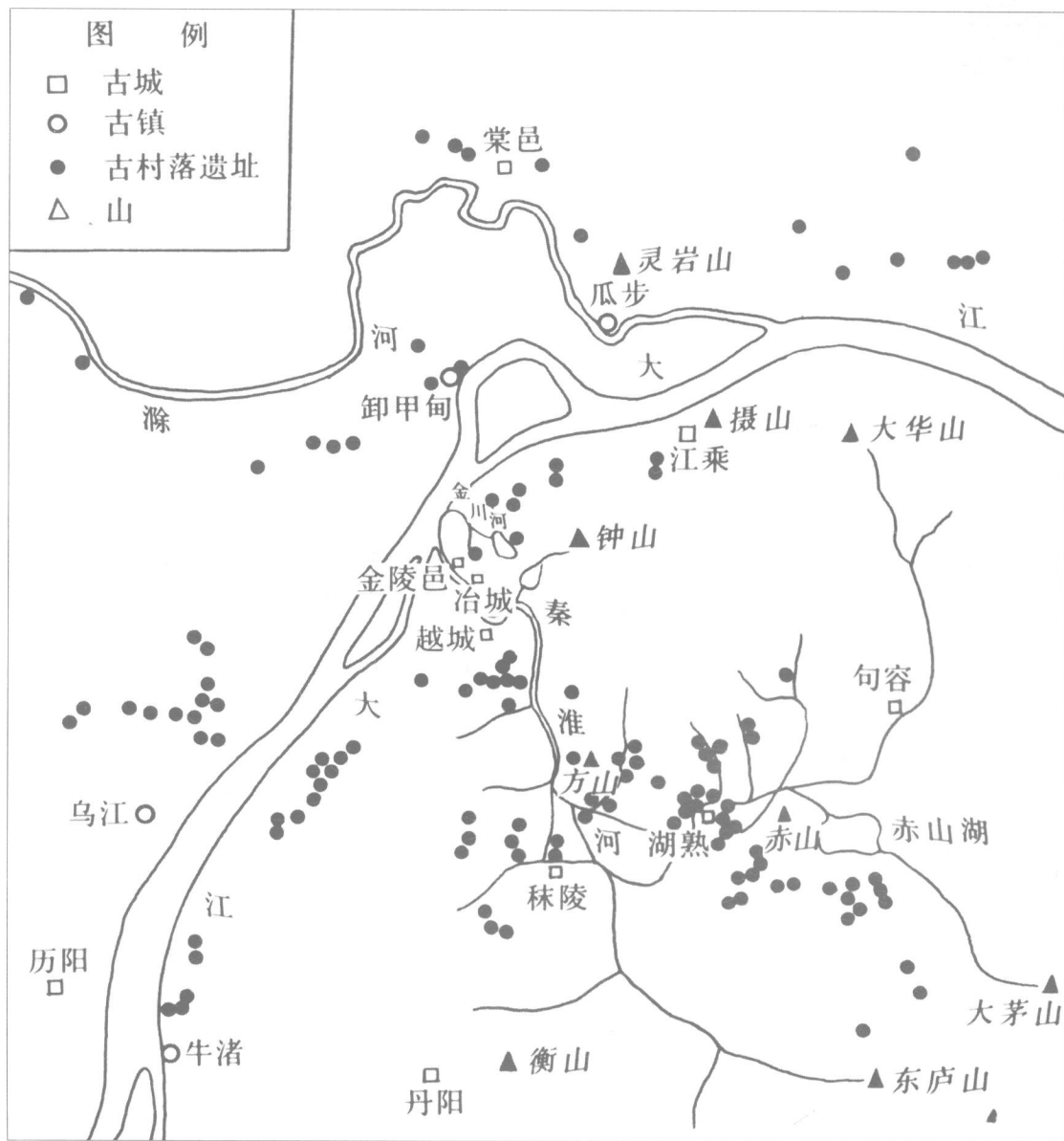
同时，从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湖熟文化虽然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工，不但难与中原地区相比，就是与江南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等地区相比，都是较为落后的。即以青铜器为例，湖熟文化遗址中仅发现青铜箭头和小刀、鱼钩等小件青铜器，还没有出现青铜容器和戈、矛等大件兵器，更不用说鼎、彝等大型礼器了。也就是说，直到湖熟文化时期，南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能够促使国家和城市的产生，也无法阻挡

周边地域文化向这一地区的浸润扩张。

大约到了公元前12世纪，中原周人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下游。周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奔荆蛮”，没有选择湖熟文化区留居，而是选择了较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吴地。周人和当地土著共同建立了吴国，而周人带来的先进的中原文化，也使吴文化得以更快地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泰伯奔吴，南京为吴国中心地区。其依据是南京南郊到镇江一带，多次发现

两周墓葬。无论泰伯奔吴最初的落脚点在哪里，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先于南京地区，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封泰伯、仲雍的后人周章于吴地，正式确立了诸侯国的合法地位。南京地区遂成为吴国的属地。稍后，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不断向东扩张，其前锋也达到了南京地区。

这就决定了南京地区在此后1 000余年间，必然处于多种文化交锋争夺的边缘地带。



《古城邑和原始村落遗址分布图》，引自《南京城市规划志》

从边缘走向中心

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汉代末年的1 000多年中,南京地区始终未能改变其边缘地位。

在早期的吴、楚相争阶段,南京地区处于双方争夺拉锯的前缘。古人形容南京地区的位置是“吴头楚尾”,是生动而形象的。也正因为此,吴国和楚国在今天的南京主城区都没有进行任何建设。南京地区最早的建置出现在长江北岸,公元前六世纪,楚国在今六合滁河下游一带,建立棠邑,并曾任命伍子胥的兄长伍尚为棠邑大夫。据说棠邑是有城的,但其址已不可考。这座古城的规模范围不会太大,只相当于边境地区的军事堡垒,兵家必争,所以在吴、楚、越三国的争战中屡屡易手。

而在长江南岸,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京地区的早期开发,是由南往北逐步推进的。

虽然南京地区被认为是吴国的属地,但吴国的首都在今天的苏州地区,今无锡、常州一带是其开发中心。吴国和楚国早期的争战地点,是今江宁区东南的衡山(今横山)和镇江市的丹徒县,也说明当时的南京地区还没有引起双方的重视。

直到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吴国的开发建设第一次推进到今高淳固城湖北岸。吴国在溧水县西南90里今固城镇建濑渚,称濑渚邑,同时在固城湖畔筑成周长40里的相国圩,“筑土御水,而耕其中”,由自然垦植进入围垦种植。这标志着南京地区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伍子胥奔吴途中,在濑水旁遇到浣纱女子的记载看,当地的纺织业也已有一定基础。濑渚邑的规模不大,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引《图经》记其周长为“七里二百三十步”,但这很可能是历代增筑的结果。

濑渚最初只是一个防御楚国侵袭的军事据点,并且很快就成为楚国攻击的目标。第二年,吴国就不得不在西面的陵平山上另建邑城,称陵平。周景王十年(公元前535),楚国占领濑渚邑,据说曾在那里建造宫殿,作为楚平王的行宫。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伍子胥率吴军伐楚,收复濑渚,放火烧毁楚宫,也毁掉了濑渚古城。

吴楚相争,吴越争霸,是江南地区早期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曾经灭越抑楚、王霸天下、不可一世的吴国,终因穷兵黩武,在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被越国所灭。吴国的领土都成了越国的疆域,而南京地区则成了越国与西方楚国、北方齐国对峙的前锋。灭掉吴国的第二年,雄心勃勃的越国,就将军事据点沿秦淮河向北推进到今长干里一带,修建起越城。

最早记载越国建越城的文献,是传为东汉人袁康、吴平所辑录的《越绝书》。但《越绝书》在北宋已亡佚五卷,今天只能在《太平御览》中看到有关文字了。《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越城,去宫八里。”指明其地距六朝宫城八里。又说:“案《越绝书》,则东甌越王所立也。”

此后的文献中,这一说法陆续被丰富。

越城的确切位置,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的注文中所说甚详:“越王筑城江上镇,今淮水(南)一里半废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筑城,东南角近故城望国门桥,西北即吴牙门将军陆机宅。故机入晋所作《怀旧赋》曰‘望城之纡余’,即此城。在三井冈东南一里,今瓦官寺在冈东偏也。”越城遗址在宋代还被作为军寨,明代与新建的大报恩寺东西相对,清代中期还没有完全湮灭,可以确定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一带。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中的《吴越楚地图》

越城为越国所建，固然不错，但建城者是否为范蠡，则大有疑问。有的书籍中确指越城中有范蠡的住宅，甚至猜测越城是范蠡的封邑。然而据《吴越春秋》卷十记载，范蠡因为深知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遂在灭吴的当年九月，就辞官远避，“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所以范蠡不可能在第二年再到南京来修造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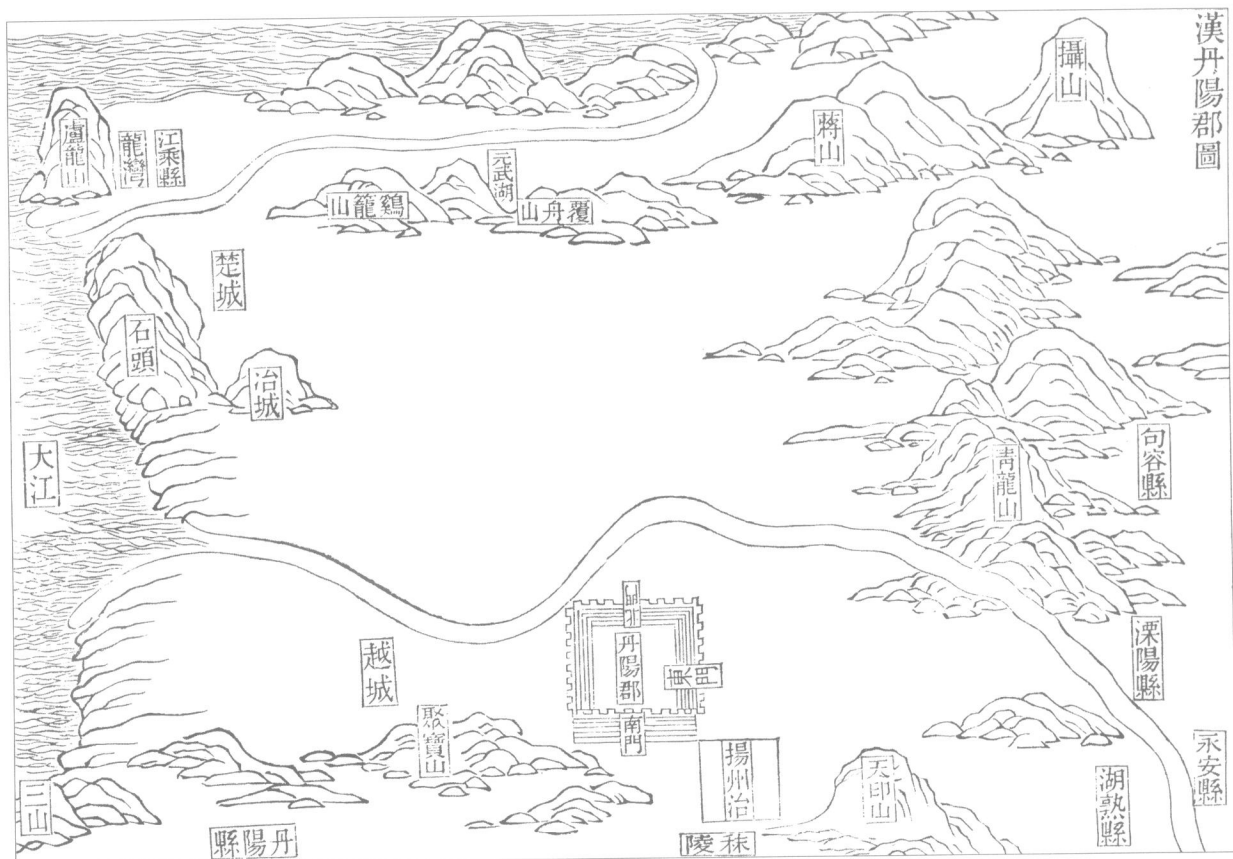
《六朝事迹编类》引《图经》说越城“周回二里八十步”，周长只有“二里八十步”，约合今942米，城内面积很小，比70年前吴国所建的濂渚邑还小得多。可见越国建越城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造一个前沿军事据点。清顾炎武《肇域志》引《宫苑记》：“越灭吴，范蠡筑城于长干以图楚。”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说，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范蠡佐越灭吴，欲图霸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张威势。”《六朝事迹编类》说越国“筑城江上，以镇江险”，也都是这个意思。后人评价越城

“扼江控淮”，“城址与长干山相连，形势特重”。越城南倚雨花台，本国的繁华地区都在它的后方；其北的秦淮河是它的一道天然屏障，沿秦淮河又可以进入长江。所以它进可以逼楚，退可以保国，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

就是这样一个突出在越国前端的军事据点，被认定为南京地区建城的肇端。南京地区约2500百年的建城史，就是从越城算起的。

当代不少书籍中都说到越城“城垣之外则有密集的居民与工商业，成为南京最早的市场”。我不知道这样说的根据在哪里。

首先，尽管吴、越两国都掌握了青铜器的冶铸工艺，但考古研究至今没有发现吴、越两国的货币，可见吴、越时期还处于以物易物或实物货币阶段，也就是说商品经济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位于边界处的越城一带，更不可能有密集的商业活动。



《金陵古今图考》中的《汉丹阳郡图》

其次,虽然没有文献明说越城周围的经济环境,但从后代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越城初建时期,其周围应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从秦代南京地区立县的情况看,邻近今天主城区的三县,一是秣陵县,其县域包括今南京主城区的大部,但县治设在今秣陵关;二是丹杨(亦作丹阳)县,县域在秣陵县南,县治在今江苏、安徽交界处的小丹阳镇;三是江乘县,县治在今栖霞山附近。这几个地点,也都是从新石器时代就有大量居民聚集的地区。

毋庸置疑,被选择作为县治所在的地点,一定是人口较稠密,农业、手工业以至商业较发达之处。显然直到秦代,长干里一带仍然不在此列。从越城建城到秦统一天下,其间只有251年,以当时的人口增殖和经济增长速度,说秣陵、丹阳、江乘三县治是在这期间迅速发展而超过越城一带,也是难以服人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它们原本就比越城一带繁荣。同样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汉初分江乘县地,立湖熟县,县域包括今

南京主城区的北部和东部,县治则设在今湖熟镇;西汉时在湖熟附近开发刘阳湖,“阡陌纵横,鱼米甚丰”。从湖熟县的设置和刘阳湖的开发相对较晚,也可以看出这个从南向北推进的趋势。

当然,越城时期,长干里一带的秦淮河两岸,可能主要是南岸,不能说就完全没有居民,而且因为驻军生活的需要,手工制作和商品交换也会有一定的发展。但由此就断定这一带已经成为南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很不慎重的。

越国的强盛也只保持了140年。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因为越军攻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建康实录》载:“越霸中国,与齐、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其地又属楚,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楚之金陵,今石头城是也。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南京自此得名金陵,得名之因已交待得清清楚楚。到了南宋周应合的

《景定建康志》中，又出现了因此地“有王气”，楚王遂“埋金以镇之”而得名金陵的说法。楚王埋金，到唐代尚无记载，宋人又从何得知？显然是后人的附会了。

《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引《江乘地记》：“石城山岭嶂千里，相重若一……山上有城，因以为名”，“后汉建安十六年，吴孙权乃加修理，改名石头城，用贮军粮器械，今清凉寺西是也”。东吴的石头城既是据金陵邑“修理”而成，所以可以肯定，金陵邑的位置就是石头城的位置，在今清凉山上，踞山临江。它也是自吴、越以来，第一次进入南京主城区的建筑。但金陵邑的规模和形制，都不见于记载。根据当时的建筑水平，它应该与越城一样，都是土城。金陵邑是南京主城区内最早的政区建置，然而其所辖范围同样也无从考查。《史记·樗里子甘茂传》载：“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战国策·楚策》载：“越乱，故楚南塞濑胡而郡江东。”厉、濑、陵、溧在吴语中发音相近，即濑渚一带；文中说到楚国所占有的越地，即以濑渚为代表，足以证明这是当时最被重视的地区。“郡江东”为动宾结构，即“郡有江东”的意思，所以《史记正义》释为“吴越之城皆为楚之都邑”，未必特指“江东郡”，似不能据此就肯定楚国有一个“江东郡”，而且治所就在金陵邑。

曲解古文史意以抬高南京地区在那一时期的地位，是没有必要的。

楚国的金陵邑，实际上与越国的越城一样，只是一个前沿军事据点，目的在于加强对新占有土地的控制。而楚国选择在石头山上设置金陵邑，也不是突发奇想的结果。

楚国的中心在南京的上游，它更重视长江的航运交通，是很自然的。先秦时期的长江水道，要比今天偏东，秦淮河的入江口，在今莫愁湖一带，今天的外秦淮河，就是当时的长江主航道。一方面，江水直激石头山下，建在这里的金陵邑能有效地控扼长江水道；另一方面，石头山下也有适宜作为渡口的自然条件，所以六朝以降石头津能发展成为重要的沿江口岸。石头山被选中是因为它在军事和交通上的地理优势。

而金陵邑和濑渚之间的交通，可能主要就是依靠水运，自长江上溯秦淮河，两者之间，没有陆上道路相联系的痕迹。另一个事实是，虽然楚国有成熟的货币制度，但石头城一带从没

有发现过楚国的货币，可见这个军事据点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稀少，将它说成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显然难以成立。

不过，楚国与吴、越争锋，尤其是楚国取胜之后，对南京地区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从栖霞山下到石头城北沿江一线，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即为原始村落较为集中的地区，又得水运交通的便利，军队的往来必然会促进农产、商贸和运输的发展。

由此可见，南京主城区最初的建设发展，都在滨江地区。也就是说，南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沿江发展的城市。

直到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楚国才彻底灭掉越国。但此时的楚国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事实上，楚国正是迫于西方秦国的凌逼，才不断向东谋求发展的。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已将首都东迁到安徽寿春的楚国，终被秦国灭亡。

秦代短暂的统治期间，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依照各地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设置郡县。南京地区先后分置五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改楚棠邑为棠邑县，又改楚平陵邑（即原吴国陵平邑，楚占据后改名平陵）为溧阳县，可见这两地自楚国设邑以来，是持续发展的。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冬，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据《史记·秦始皇纪》载，东去时沿江而下，经过丹阳至钱塘，返程时从江乘渡江北去，由此可知当时有丹阳县和江乘县的设置。这里所说的丹阳县不是今属镇江的丹阳，而是以苏、皖交界处小丹阳为县治的古丹阳。江乘县的县域很大，自石头山沿江迄东过栖霞山，直到今句容下蜀镇，再南下到今江宁区淳化镇，大约将今南京主城区内的金川河流域都包括了进去，以及后世丹徒、句容、江宁三县的一部分。为什么新置的江乘县面积会这么大呢？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它的地广人稀，而且人口主要集中在钟山以东区域，所以县治设在栖霞山下。至于今天的南京主城区内，很可能人烟稀少，甚至杳无人迹。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战国中期是中国人口的相对高峰期，平均每三平方公里才有10个人，如果以每户五人计，一平方公里还摊不到一户。而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聚族而居，单家独户分散生活的情况是不多的，“这就可以断定，全国有大部分地区是

无人区”。

最后一个是秣陵县。《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秣陵”：“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建康实录》的记载颇有传奇色彩，说秦始皇在江乘渡江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秦之秣陵县城，即在今县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故城是也。”秦始皇开秦淮河的传说，已经为前人研究结果所否定。但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返程时的路线，仍没有经过金陵邑一带，而是从钟山的东面插到栖霞山西边的江乘县的。也就是说，他恰恰丢下了今天的南京主城区，可见当时那一带不但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内容，而且可能连交通道路都没有。秦代的秣陵县域，据说北界应抵达金陵邑一线，包括了今南京主城区内秦淮河流域的大片土地，但县城设在秦淮河中游今秣陵关，几乎是县境的最南端。其不选择位置相对适中的越城或建造在先的金陵邑，也证明当时秣陵关一带的社会经济发展，要远远超过仅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的越城和石头山一带。至于隔着一座钟山和大片的原始森林，就能望出金陵500年后的“王气”来，也让人难以置信。由此后推500年，正值东晋在南京建都，这些神话应该都是东晋人所编造出来的，待后文再细做讨论。

近世有些著述称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毁弃各国城邑时，金陵邑也遭到破坏。此说的根据是《越绝书·吴地传》中的一句话：“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坏诸侯郡县城。”这条记载过于含糊，似不足以为据。秦始皇对于废弃的诸侯郡县城，可能会毁坏，但对于延续的郡县，想必不会毁旧城再重建新城。南京地区的棠邑和溧阳，就都没有毁城的记载。据前引《后汉书》、《建康实录》，都只说秦始皇“改”金陵地名为秣陵，并未说“坏”金陵邑。其实对于统一了全国的秦王朝来说，越城和金陵邑这样的军事据点，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很可能就是任其弃置而已。前引《江乘地记》也说“吴孙权乃加修理”，废弃400多年的土城金陵邑需加修理才能重行使用，不足为奇，不能据此就断定其为秦始皇所毁。

汉代初年，郡、县及侯国的建置变迁频繁，但南京地区的发展，主要仍在原有的五县范畴之内。汉承秦制，棠邑县、溧阳县、丹阳县、秣陵县均没有变化；只有江乘县因为县域“东

西所及甚远”，所以将其东部的辖地析出，北部置句容县，南部置胡孰县，一县分成了三县。胡孰县治就在今江宁湖熟镇，这里从新石器时期就已是原始村落集中的地区。

吴楚“七国之乱”后，为了削弱原有藩王的势力，汉武帝实行“推恩分封”政策，即在藩王属地中设置更小的侯国分封其子弟。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秣陵、胡孰、丹阳三县都成为侯国，以县城为封邑。由此可见三县当时已建有县城，亦可见当时的经济繁盛之区，仍集中在南京的南郊一带。直到20世纪末，湖熟、秣陵一带兴修水利，窑场取土，都会发现大量的汉代陶罐，并伴有汉代铜镜、钱币等出土，而在南京主城区内就没有这种发现。如前所述，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西汉时已在开发湖熟附近的刘阳湖。根据这个自南向北的发展趋势，在两汉的400多年中，农业的开拓北进至今长干里一带，直至越过秦淮河到达北岸，是势在必然。而考古发现也证明，最接近越城的秦淮河南岸地区，即今天的中华门西地块，确实是南京主城区内开发最早的区域。同时，剩余产品的增长，导致商业的繁荣，而秦淮河畔优越的交通条件，也会使其得到一定的发展。不过，当时这一地区农副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商业贸易水平，都不能估计得过高，至多也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东吴定都建业10年之后，还必须从苏南、浙东等地转运粮食给养，就是一个明证。《隋书·地理志》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反映的仍是自给自足状态。在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地区，只要不发生大的天灾人祸，维持温饱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今人研究南京城市发展史，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以为越城、金陵邑和以后的六朝都城之间，有一种承继关系，因此想当然地以为，越城和金陵邑都是那一时期的城市中心地区。这就导致对于那一阶段南京地区的真实发展状况难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近现代的一些著述中称，吴王夫差曾在今朝天宫后的冶城山上，设置冶城，铸造兵器，并以此为南京建城之始。如果所述属实，这确实应该是南京主城区内时代最早的建设项目。然而此说是难以成立的。

这一说法的源头，要追溯到六朝时期的著作。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一条，南朝梁刘孝标的注文中写道：“《丹阳记》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冶（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冶（治），汉高六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

这段注文有多重含义。说到了冶城的位置、冶城的作用，也说到了冶城的来龙去脉。按刘孝标的推测，冶城应该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所建的秣陵县城，到了孙权建石头城，没有必要在距离石头城很近的地方另立一城，所以将县治迁往石头城，以便统一行政管理；空下来的旧县治，就改作冶铸场所。但是这一猜测又与《丹阳记》中的“孙权筑冶城”相矛盾。《丹阳记》的作者山谦之是南朝宋人，所言或者更为准确。其实汉代的秣陵县城位置明确，仍在秣陵关，刘孝标没弄清楚，所以会有此一误猜。

明人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吴越楚地图考》中写到，“金陵在春秋时，本吴地，未有城邑。惟石头东有冶城，传云夫差冶铸于此，即今朝天宫地。”后人遂以陈氏此言为据，将冶城说成是夫差所建，甚至将建设年代精确地推定为公元前495年。也有人试图调和两种说法的矛盾，提出此冶城是夫差初建，孙权恢复和扩建的。其实陈沂说得很清楚，“夫差冶铸”一事是“传云”，也就是说，在明代已经有此传闻。但陈沂在后文谈到越城时，明确地说：“金陵有城邑，自此始也。”可见他并不相信那传说，至少是认定冶铸场所不能算正式的城邑。

《丹阳记》在宋代已经亡佚，所以明人传说的依据，可能就是前引刘孝标的那一段注文中，“吴时鼓铸之所”一句。但是直到今天，讨论者都忽略了其后的一句：“吴平，犹不废。”这个“平”字不是随便用的。春秋时期，越与吴都是诸侯国，“春秋无义战”。越灭吴，是不能称为“平”的。只有被认为正统的晋灭东吴，才能称为“平”。所以，这个“平”字已经清楚地说明，建冶城的只能是孙权的东吴。当代在冶山上的考古工作，也至今未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冶铸遗迹。

孙权将冶铸场所建在山上，而不建在交通便利的平地上，也是有原因的。曾有人解释为孙权冶铸的主要是兵器，建在山

上有安全和保密的好处。这也是从今天城市人口众多、建筑密集的现状产生的想当然。当时的南京地区，基本上还是荒无人烟的旷野之地，兵工厂的保密与安全都不会成为问题。笔者读中国陶瓷史，才明白应该是为了燃料取用的方便。燃料的运输量显然要比冶铸产品的运输量大得多。中国不少古窑址的迁移，都是因为附近的树木被烧完，不得不另迁往燃料丰富之处。

综上所述，冶城作为冶铸场所的性质本无疑问，其建造时间也可以确定，所以在南京城市成长史中，就不再加以讨论了。

城市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进步。今日中国，城市不但是居民最密集的区域，也是非城市居民向往的生活环境。然而，中国古代的城市，与西方不同，并不是人类居住的自然形态，甚至也未必是由人类聚居生活环境自然演进的产物。中国早期的典籍《说文》中释城：“城，以盛民也。”《释名》中的解释则是：“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吴越春秋》中说到建城的目的：“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之遭天灾，厥黎及康。乃筑城造郭，以为国固。”“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遂被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原则。也就是说，城市首先是君王为了建构其统治权力而产生的空间形态。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城市对于乡村居民的吸引力也并不是太大，因为城市不断地遭遇兴衰更迭，而乡村反而能较为平稳地发展，成为村民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只要营养和生育的“自给自足”依然是生活的主要目的，村庄就足以让一代又一代村民们愉快地生活下去。

城市的胚胎构造虽然源于村庄，但由村庄自发形成城市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由村庄发展而成的城市极少；大量的情况则是，已形成的城市采取强制的移殖手段，向广大村庄拓展，以形成新的城市。这个过程迅速得多。南京地区最早的越城与金陵邑，就是这种移殖的产物。两城的建筑之地原本很少甚或没有居民，建造者都不是原住民，其建造的初衷，既非“卫君”也非“居人”。它们实际上是外来的侵占者强加给原住民的一种压迫形式。

甚至六朝时期所建的都城，与当代意义上的城市，也相差甚远。